

七日談

（澳門篇）

在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百折不撓的奮鬥歷程中，港澳台命運一體。澳門為葡萄牙人據居之後，荷蘭人企圖攻佔澳門，在中國建立貿易基地，敗退之後去了澎湖列島，開始了台灣的殖民史。此後，英國人也覬覦澳門，未果，轉往浙江舟山，鴉片戰爭之後佔領了香港。

抗日戰爭爆發後，台港澳三地都奮起抗爭。從三地分別因國弱為外族佔領到奮起共同抗日，都顯示出強烈濃厚的民族氣概和對和平發展的不懈追求，充分展示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偉力。

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壯闊史詩中，台灣同胞用鮮血譜寫了特殊而悲壯的篇章。自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後，這片土地雖被殖民者鐵蹄踐踏五十年，但台灣民眾的民族氣節從未屈服。當全面抗戰烽火燃起，他們跨越海峽，與大陸同胞並肩作戰，以生命印證台灣與祖國命運與共的不朽誓言。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反抗運動從未停息。1930年震驚世界的「霧社起義」中，賽德克族首領莫那·魯道率眾反抗日本壓迫，血戰五十餘日，最終在日軍毒氣彈與炮火中壯烈犧牲。這場「生而為人，自由尊嚴高於生命」的抗爭，體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的反侵略精神。

知識分子以筆為劍，林獻堂等人在1920年代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自治權利，傳播民族意識。詩人賴和寫下「勇士當為義門死」的詩句，將文化抵抗深植人心。這些抗爭雖遭殘酷鎮壓，卻為抗戰全面爆發後的大規模行動埋下火種——據日本總督府統計，僅1937至1945年間，台灣因「反日思想」被捕者逾萬人，足見民心向背。

想」被捕者逾萬人，足見民心向背。

抗戰爆發後，超過5萬同胞奔赴大陸投身救國鬥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友邦將軍組建的「台灣義勇隊」。1939年於浙江金華成立後，這支隊伍迅速發展至千餘人，成員包括醫生、技術員、青年學生。他們深入前線，承擔醫療救護、敵後情報、宣傳動員等重任，更設立「台灣少年團」，培養抗戰新生力量。

來自台灣的醫生在戰場上創造生命奇跡，義勇隊附屬醫院救治數萬軍民，自製寧藥緩解瘧疾疫情。技術兵則利用日語優勢破譯日軍密電，為台兒莊等戰役提供關鍵情報。李友邦提出「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雙重使命，彰顯同胞將個人命運與民族解放緊相連的自覺。1945年重慶《新華日報》載文盛讚：「台灣同胞五十年來的抗日鬥爭，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

即便在日軍高壓統治下，島內抵抗暗流依然洶湧。1939年高雄碼頭工人集體破壞日軍物資運輸，基隆礦工以怠工拖延煤炭供應。農民則故意減產糧食，迫使日軍從東南亞調糧補給前線。

文化抵抗更為深遠。詩人吳濁流創作《亞細亞孤兒》，借主人公胡太明之口吶喊：「我不是孤兒！我的祖國在海峽對岸！」小說手稿在嚴查中秘密傳閱，成為喚醒民族意識的火炬。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強徵20餘萬同胞充當軍夫或後勤，許多被派往東南亞戰場的台籍士兵暗中協助盟軍戰俘，或向當地游擊隊傳遞情報。菲律賓戰役中，曾有來自台灣的翻譯冒險釋放美軍戰俘，自己最終被日軍處決。



◀台灣霧社原住民抗日群像。資料圖片

台灣同胞的抗戰不僅為民族大義，更為使寶島重歸祖國版圖。1943年《開羅宣言》明確宣告「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如台灣、澎湖必須歸還」，這份奠定戰後秩序的重要文件，凝聚着包括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

1945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於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接受日軍投降。當陳儀宣布「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全場同胞熱淚盈眶。親歷者回憶：「人們焚燒寫有日本名的戶口簿，街頭遍掛『光復』燈籠，爆竹聲三日不絕。」這一場景印證了同胞堅守五十年的家國信念——台灣的命運始終與祖國一體，抗戰勝利終使游子歸家。

在台灣光復八十周年的今天，島內「台獨」勢力妄圖割裂歷史，卻無法抹殺先輩用生命鑄就的真相：霧社起義的獵槍、義勇隊的戰旗、少年團的歌聲，無不訴說着台灣兒女對祖國的忠誠。他們的抗戰史詩證明，台灣同胞的

來侵略的縮影，更是兩岸同胞以血肉之軀共禦外侮的悲壯詩篇。

從港澳到台灣，被殖民的歷史淬煉出中華兒女更熾熱的家國情懷。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這份跨越海峽的碧血丹心，依然是兩岸同胞共創未來的精神火炬——它照亮來路，更指引歸途。

從荷蘭人退離澳門轉據台灣的1624年，到英國人棄澳門取香港的1842年，歷史證明，列強的炮艦可以割裂地理，卻斬不斷文明的根脈。

當李友邦在浙東高舉義勇隊火炬，當張婉華駕舢舨穿越港島炮火，當林耀在澳門琴鍵刻下復國誓言，三地兒女用三百年抗爭寫下同一部啟示錄：媽祖的令旗終將拂去殖民塵埃，珠江的春潮必會融會基隆的海浪。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航圖上，港澳台不是孤島，而是巨輪破浪時，舷邊最璀璨的浪花。

知識與見識



人生在線
方敏

暑假接近尾聲，妹妹明天就要開學了。這也是家姐基礎教育階段的最後一個暑假，這些天也開始進入了「溫習模式」。

一個多月來，我們行程一萬兩千多公里，相當於半個長征。其間，也留下了很有趣、頗難忘、值得回味的瞬間。

我帶姐妹倆去了三所大學，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到香港大學，再到我的母校南昌大學，讓她們對世界一流大學有了更直觀的認知，居然有底氣提出「Shaping the Future」（塑造未來）。有一次，妹妹與她的朋友們很自豪地說：「媽媽的學校比爸爸的學校好，而且是學醫的，她更聰明一些。」姐妹倆對讀好書有了更高的要求，目標很清晰，妹妹還會不時在谷歌上搜索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從哈佛到麻省，再到斯坦福。

從知識到見識，這或許是旅行的最直觀體現，也會投射到日常行為中。有一次，妹妹與朋友在聊天時告訴她：「不要看太多短視頻了，會影響我們的思考能力。」這讓我和這位朋友的媽媽都很驚訝。

進入八月後，妹妹最期待的是與泳隊隊友們自助餐。此後，我們增加了游泳頻次，在午間游的基礎上增加了「早水」（即早上八時游泳），每次各兩小時。有一次，我把游泳時間記錯了，是妹妹提醒我還要早一小時，我核對後發現果然是的。然後，她很早就開始提醒我：「該出發了……早點出發吧……」在我沒有直接回應時，她自言自語地說：「稍後可能要下雨，會塞車，還是早點去。」果不其然，等我們出發的時候，空中有細雨落下來，不一會兒又掛了「紅雨」信號。

前些天，先生打算用舊手機查個資料，不過因為長期沒有使用，而中間又換了其他的手機，把密碼忘了。他試了五次後，被鎖定一分鐘；試了第六次時，被鎖定五分鐘；第七次輸錯密碼時，被鎖定十五分鐘。此時，他還不心死，第八次輸錯密碼，手機被鎖定一小時。實在忍不住了，才跟我商量，我當然也不記得他的密碼，建議他問一下家姐。此時，妹妹在旁邊喃喃地說：「你的手機密碼不就是080808嘛！」

對孩子們來說，暑假最開心的是回鄉探親，給奶奶過生日，給外公倒酒，請舅舅帶去兒童公園玩耍。從她們的身上也看到了感恩之心、養育之恩。臨行前，我們買了一些手信，打算分發給親友。然後因為臨時增加了一些行程，把手信分給了朋友們，導致舅舅和叔叔家沒了。返程時，妹妹問我：「不是應該送給最親的人嘛，為什麼都送給朋友了？」接着又說：「你與舅舅、叔叔關係那麼好，為什麼不送呢？這個好像有點不對的。」正當我無意解釋時，她又說了一句：「建議你過幾天去買一些，快遞過去。」我滿口答應。

若干天後，在她游泳結束後，我們去附近的商店買了一些曲奇。看來，我還得湊空去深圳寄一下，給她一個答覆。

八天前，我帶妹妹去游「早水」。起床時，已掛起「紅雨」信號，我盤算着很快會掛「黑雨」信號，可能不必前往。不過，她一直催着我早點出門。就在我們抵達泳池時，確實掛起了「黑雨」信號，她自信地說：「幸好，我們來得早！」就在很多人無需上班、上學，多了一個向天借來的懶覺時，我們已在泳池「激流勇進」，讓我看到了自驅力、進取心。

對，劈波斬浪，終會掌聲如潮；追光的人，必定光芒萬丈！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提到「弗拉芒原始派」（Flemish Primitives）的開山鼻祖揚·凡·艾克（Jan van Eyck），很多人會本能地想起他和哥哥休伯特所留下的不朽名作《根特祭壇畫》。這組收藏於根特市聖巴夫教堂的傳世經典如今仍在接受世人絡繹不絕的「朝聖」。可實際上，揚·凡·艾克在根特市留下的痕跡並不多，他的主場是幾十公里外的布魯日。

重返布魯日，一個重要的功課就是尋找這位「弗拉芒原始派」巨匠曾經生活的痕跡。一四四一年，揚·凡·艾克在布魯日去世，距今已經五百八十四年。即便整體保存尚好的布魯日屬於世界文化遺產城市，但這座古城在漫長的歲月中也歷經了諸多風雨。一位去世五個多世紀的繪畫大師，究竟還能留有多少曾經存在過的印跡？

去年一日遊頗為匆忙，連布魯日老城區都沒逛。既然試圖尋找揚·凡·艾克的足跡，自然從老城開啟。距離酒店不遠處便是著名的聖血教堂（Heilig-Bloedbasiliek），其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存放着是十二世紀十字軍東征時所帶回的沾有耶穌基督鮮血的一塊亞麻布。在聖血教堂的斜對面有一家皇冠假日連鎖酒店（Crowne Plaza），本身毫無特別之處，但酒店所在位置頗有來頭——是建在曾經布魯日最重要的聖多納蒂安教堂（Sint-Donaaskathedraal）遺址上的。聖多納蒂安是布魯日城的守護神，揚·凡·艾克曾在城內最重要的格羅寧格博物館（Groninger Museum）所收藏的《聖母與教士喬瑞斯·凡·德·佩勒》中描繪過他的形象。當揚·凡·艾克去世後，他被安葬在聖多納蒂安教堂內。遺憾的是，一七九九年，入侵布魯日的拿破侖法國軍隊將教堂摧毀，長眠在此的揚·凡·艾克之墓也從此不知所終，唯有教堂部分地基尚存。時至今日，遊客仍可通過皇冠假日酒店到

尋找揚·凡·艾克



◀揚·凡·艾克廣場。

作者供圖

地下參觀教堂的地基遺址，但想拜謁大師已無可能了。

沿着聖多納蒂安教堂遺址往北方走，不遠處便是揚·凡·艾克廣場。這也是布魯日城能在地圖上找到的唯一和揚·凡·艾克相關的痕跡。廣場緊挨河道，中央石頭基座上豎立着十九世紀布魯日雕塑家亨德里克·皮克利於一八七八年為揚·凡·艾克塑造的銅像。雕塑中的揚·凡·艾克頭戴英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其親筆《男子肖像》中的同款頭巾，左手拿着祭壇畫的畫板，右手執筆眺望遠方。結合其銅像背對着狹長河道的位置，給人一種深遠之感。如今，廣場周圍都是咖啡館和餐廳，遊客們在河邊拍照後坐在他銅像下的石台上休憩，至於這位布魯日城曾經最耀眼的繪畫巨匠，似乎已無人問津。圍着雕像四周找角度一頓拍的，僅我一人。

沿着揚·凡·艾克廣場再往北走，開始步入安靜的聖吉爾斯（Sint-Gillis）區，就和遊客區漸行漸遠了。這個區域主要圍繞着宏偉的聖吉爾斯教堂（Sint-Gilliskerk）建立，是布魯日城一個歷史悠久的靜謐區域。從十五世紀開始，由於許多當時著名的藝術家如揚·凡·艾克、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彼得·普布斯（Pieter Pourbus）等人均居住在此，因此成為了當時著名的藝術家區（很像十九世

紀巴黎的蒙馬特）。揚·凡·艾克自十五世紀三十年代初搬到布魯日直至一四四一年去世，在他位於Gouden Handstraat 6號的故居住了十餘年。如今這棟黃紅磚拼接而成的宅子，看程度應該是翻修重建過的。和梅姆林的故居外設有銅牌不同，揚·凡·艾克的故居外牆上毫無任何標記，看起來就是普通的民居，若非從網上做過功課根本找不到這裏。想近六個世紀前的北方文藝復興時期這個區域是那樣星光熠熠，如今街巷中空無一人，當真是物是人非了。

轉身離開揚·凡·艾克故居所處的窄街，又抬頭看了一眼街名。[Gouden Handstraat]，我憑藉連蒙帶猜的荷蘭語似乎讀出了它的潛台詞。上網一查，果不其然——「金手大街」。猜測這街名是後人給取的，用他身上確是實至名歸。

在布魯日尋找揚·凡·艾克，更像是在印證一個歷史悠久的傳說。故居被推倒重建、銅像為後人所立、長眠的教堂蕩然無存……能提醒世人他在古城布魯日曾經如日中天的證明，唯有格羅寧格博物館所藏的兩幅真跡：《聖母與教士喬瑞斯·凡·德·佩勒》和《瑪格麗塔·凡·艾克肖像》。最終，無論一位藝術巨匠曾多麼不可一世，還得靠流傳有序的藝術品來「驗明正身」啊。

俯瞰司馬台長城



市井萬象

八月十八日清晨在北京市密雲區古北口鎮拍攝的司馬台長城（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

